

文史杂谈

古代官员的教材

范方启

古代的领导干部,也要不断地加强学习,也要接受专业教育,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官德。官无其德,如何使人?统治者深深地明白这一点。培养官德的专业性的著作并不少,《官箴》、《帝范》、《臣规》、《帝鉴图说》等,都算得上很有影响的文献。从事这方面研究并且成果颇丰的大师级的人物有西汉的杨雄、唐太宗李世民、明大学士张居正等。

《官箴》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出自不同的时代,出自不同人之手,体现的是集体的智慧。《官箴》也就是针对官场的某些现象,提醒身为领导的应该怎样为官。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箴》,公认的是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出来的一批秦朝的竹简,其中就有一篇专门谈为吏之道,这就是最早的干部培训教材。大意是,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察无私。基本上将官德勾画了出来。

《官箴》在实际运用中不断地完善,西汉的杨雄也写过几十篇的《官箴》,以后历代都有《官箴》出现,仅仅被列入四库全书和史部保存的就有8部107卷之多,可以说,其专业性相当了得。

若论影响力,南宋吕本中的《官箴》当为佼佼者。吕本中本人在朝为官,属高级官员,政治经验丰富,目睹着朝廷的无能和官场的腐败,他感到改朝换代只是时间的问题,为提醒后人重蹈覆辙,便将自己的所感所悟辑录成册,虽然只有33则的篇幅,但言简意赅,的确为官德培养的经典之作。

吕本中提出,为官要做到“清、慎、勤”。这三点被后人称为千古不易的为官之道,清乾隆帝曾专门手书这三个字刻在石头上,以示推崇。

在吕本中看来,为官必须要树立“清、慎、勤”这三德,得此“三德”,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到皇帝的肯定,可以取得下级或者老百姓的称赞。立德事实上也就是方便自己。当官的人见财不能自制,自认为拿点钱拿点什么都没关系,则无所不为,结果只能是自毁前程。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权智,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初不为之愈也。”这话的意思是说,做了错事,后来费多劲来补救,当初为何不警诫自己不干那些作奸犯科的事情呢?深入浅出,一本难得的好教材。

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之手的《帝范》,是唐太宗当皇帝当出的心得。帝范,帝范,也就是做皇帝的规范,表面上是针对帝王,实际上没少针对官员,也是官员立德的一部好教材。《帝范》其实是太子李治所写的,唐太宗也有着秦始皇一样的私心,希望江山一直姓李,说与家人的话语自然都是一些肺腑之言。唐太宗从君臣、建策、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阅武、崇文等方面谈怎样去当一个皇帝,可谓用心良苦。除此之外,他自己还编了一个《自荐录》,都是自己深刻的体会。

武则天为教育臣子编了一部《臣规》,意思也就是做大臣的规范,苦口婆心地告诫大臣要怎样忠于国家、忠于皇帝,要怎样的工作。

明朝大学士张居正的《帝鉴图说》是写给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神宗当时年龄很小,张居正辅佐他,为了能使神宗看得懂,用了不少直观的图画。图画加故事,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性的连环画,这样的连环画的读者一直不少,以至于后来的市面上都能找到《帝鉴图说》。81个小故事,从尧舜开始,一事一议,具有相当强烈的启发性,不仅皇帝看,众多的官员都爱看,影响力自然不可小觑。

更令商人不满的是,国民政府还强行规定各地税务机关只准用中央银行汉口新票和鄂湘赣三省通用大洋券交纳税收。这样,本来还可以低价收购贬值的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用来交税,现在不行了。

江西商人忍无可忍,于1927年2月书面请愿武汉国民政府,要求整理江西金融。

商人请愿,军人就来武的。2月2日,第3军第7师部分士兵闹饷,在南昌城里开枪示威后,每个士兵发了3块现洋才平息此事。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后方对于蒋介石急需军费非议不断,可以想象蒋介石这时内心的火气。

就在此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汤济沧给蒋介石出主意了:“上海如为我军所得,即发行公债数千万元,亦无问题,即就‘二五’附税一税而论,汉口每年仅得180万,上海则十倍之也。”

1927年1月24日,陈其采,也就是陈其美的弟弟,时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就北伐军

随笔

感悟法律之美

柴清玉

长期从事人大工作,使我对法律有了一种特殊的认识,一种深厚的感情。我惊喜地发现,终日奉为神圣庄严、与我们心神合一的法律,其实蕴涵着极美的韵味。

法律蕴涵着人类对真、善、美永恒的追寻。在她似乎冷峻的外衣下面,涌动着火一样的激情。从一个生命孕育到降临这五彩斑斓的世界,直至最后回归自然,甚至在此之后,法律就像慈母一样,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他,给予他无微不至地关怀和呵护。哲人说,一个人无论在多大年龄上没有父母,他都成了孤儿。同样,一个人缺少法律的关爱,他也是孤儿,他的灵魂注定是游走在无望的漂泊之中。

法律之美,首先美在形式。每一部看似独立的法律,都是充满生机的法律之树上的一个遒劲的枝丫。她们紧密相连,浑然一体,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法律体系。在每一部法律里面,每一个条文之间,在凝练简洁的语言背后,又都潜藏着一条厚长的主线,把它们紧紧地串联,又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一起,相对固定中富有变化,简洁明快中富有转折,语言严谨又留有发散的空间——诸如此类,无不展示着一种内在的逻辑之美、流动之美、和谐之美。

法律的美,美在程序。法律的制定,有着严格的程序,程序避免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保障法律追

求着至善之美。法律体系的运行,以铁定的规则,展示着一种严厉的规则之美,也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运行,任何人不得僭越,否则即为违法。而这程序,在设定之时,就已经相当完备,竭力引导着人们在法律的道路上前行,以避免因为运行规则的不公正而影响到人们承担法律后果的不公平。

法律之美,还美在内容。当权利被邪恶践踏,法律为你伸张正义;当利益受到侵害,法律还你一个公平;当贪婪为所欲为,法律会喝令警醒;当你遭遇困境,法律会为你解忧;当你需要特殊的关怀,法律会及时提醒人们把你关注;法律不是人类社会终极的目的,她只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艰难选择的结果,她以自身特有逻辑和经验结合而成的智慧,引导着人们逐步在走向民主的自由道路上。

法律之美,更在于她的洁净。弗兰西斯·培根在久远的年代就曾深情地提醒人们:“律法所在之处,乃是一种神圣地方。不但是法官的座席,就连那立足的平台,听证的围栏,都应当全无丑事与贪污的嫌疑才好。”应该说,法律是具有自洁功能的。她圣洁如泉水,不仅自身晶莹剔透、清爽怡人,而且时刻不停地冲刷着一些邪恶和不干净的东西。虽“独抱清高,顿成凄楚”,但来也冰清,去也玉洁,带一种精神、一种气度、一种神韵,留在烟波浩渺的世间。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由衷地呼吁:“在这个世界上,邪恶的力量太强大了,单个人的正义几乎无法实现,只有所有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战胜邪恶。”所以说,尽管法律自身是美的,然而要培植出绚丽的法律之花,要使法律的理想之美转化为现实之美,还需要立法者、执法者和全社会长期不懈地努力和艰辛地耕耘。

法律人是“戴枷的舞者”,在司法实践中,既要严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及其运行的准则,又要尽情地演绎法律得出神入化,使之不断地接近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不断地接近人性的真、善、美,并使之充满着人文主义的关怀。这,对于所有人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又有一定的深度,更有一定的高度。

法律工作者要把法律之美演绎得翩跹如蝶,首先自身就必须美丽如蝶。优秀的法律工作者,须具备良好的美德和品行,须具备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华,须具备训练有素的性格和心理特征,须具备扎实、敏锐、果敢的职业技能,须具备深思、慎言、庄重的职业修养,而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市井百姓、街头游民,不能凭借着对法律的一知半解就匆忙地决定了他人的命运,不能屈服于权势、财色而把良知抛却一边。

让我们感受法律之美,让我们尽情地演绎法律之美,让我们勇敢地捍卫法律之美!



山水清音(国画) 北山堂主

散文

小喜欢

阮小籍

董桥说,之所以给他的书起名为《青玉案》,是因了贺铸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董桥还在作品的扉页上详细注解了所有与“青玉案”有关的出处,大约最早是出自张衡的《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一句。青玉案就是美玉做的几案,男人都喜欢美玉,更喜欢挑选美玉送心爱的女人,所以董桥把作品定名为《青玉案》的确是很雅致的一件事。但我要说的不是董桥,也不是他的《青玉案》,我感兴趣的是“美人赠我锦绣段”这一句,何以赠我锦绣段呢?

美人赠我金错刀,美人赠我翠琅玕,美人赠我貂襜褕,金刀、玉琴、貂皮衣,都是男人的喜欢,我没听说过大男人喜欢锦绣段的。

读过雪小禅的一篇文章《绸缎是微凉》,雪小禅说陆小曼或者言慧珠这样的女子,她们几乎穿了一生绸缎,当它们裹在一个女人曼妙的身子里时,当一个男人把手放在女人腰间,绸缎,已经有了太多意味。言外之意,雪小禅的意思是女人的绸缎是用来吸引男人的,雪小禅举例为证,说徐志摩在家信中曾经说,小龙:买了一块绸缎给你,看看做什么合适?

雪小禅说:“这样的男人,真适合当情种。”

看来,男人的多情,除了美玉,还该用丝绸,就是锦绣段来表达。所以我不明白的是,女人为什么要送男人以锦绣段呢?

台湾的星云大师说:“人这辈子最重要的不是金钱,是喜欢。”而我,却是喜欢锦绣段的。早先,比如明代,唐伯虎和祝枝山,文证明他们袍褂穿的就是锦绣段,一袭撒花的苏绣长衫,说不出的潇洒,逼人的临风玉树;就算是民国,大宅院里老爷一把紫砂,嵌白玉黑缎瓜皮帽,湖蓝色泥金团龙马褂,圆口绣花布鞋,就算是俗气十足,也俗得喜庆,俗得有自己的范儿……可惜这些都是旧事的风色,徒让人心向往而已。

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我只想说弱地说,一个男人,其实我是那样地喜欢锦绣段。

如今家里,只有早些年结婚时妻子陪的嫁妆,有六七床丝绸的被子。说是早些年,其实都已经过了10年了,儿子都9岁了。枕边人鬓角有了星星白发,桃红色花草龙凤的被面已经有些发暗,有些地方还脱了线,细细地用丝丝绣了几只蝴蝶落在脱线的地方,一眼看去有了新婚的味道,心里就有了小小的喜欢。

美人赠我锦绣段,咱再做一床缎被吧。她听了,说,只要你喜欢。

掌故

实事求是

阎泽川

“实事求是”一词,源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河间献王传》。文中称西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特别嗜好收藏各种书籍。有一次,刘德到都城去拜见汉武帝,同汉武帝及大臣们谈论起学问道理,人们都赞扬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这一古语做了一番改造,指出:“‘实事求是’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寒林微照 陈忠南

新书架

《鲜于枢赵孟頫行草书字典》

干琛艳

鲜于枢(1256~1301),字伯机,自号困学山民,又号寄直老人。大都(今北京)人。以草书最为精妙,代表作有《老子道德经》、《韩愈进学解卷》、《论草书帖》等。

掌故

古书名意解

陈永坤

古代书名中的最后一个字,往往能概括出一本书的成书和编著方式,下面用举例的方式,分别予以说明。

一、用“抄”或“钞”。首先要明确:“抄”同“钞”,它们在意义上并无什么差异。凡用了“抄”或“钞”字结尾的书名,说明作者将某一时期的诗、文等文学作品誊写编汇在一起,整理成书,其取材务求广泛,颇有资料价值。书中除附作家小传外,一般不加编者自己的评介。如清代吴之振等人编选的《宋诗抄》。

二、用“醇”。书名中用“醇”,表示成书者通过鉴赏,选录自己认为或被公认为较好的作家作品,汇编成册,并在各篇之后常引正史或杂记以考订事实,或附录各家评语,可供参考。如清乾隆十五年御定的《唐宋诗醇》。

连载

押宝蒋介石

江浙财团的血色投资

谢国平 著

与张静江、许崇智焚香换帖,结拜为盟兄弟,张静江与蒋介石相差10岁,为老大。这一结拜之举对蒋介石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种影响也让蒋介石成为上海滩上的一个股匪。

于1920年12月15日,张静江与蒋介石等人又合资创办了恒

泰号经纪人营业所,共计股本35000元,1000元一股,共35股,资本几乎是“茂新”的10倍。

交易所成立之后不久股价即扶摇直上,蒋介石等人的投资获得了惊人的回报。

可惜好景不长,物极必反。1921年夏秋之交,上海出现了交易所过剩的状态,这些交易所如多米诺骨牌,一批一批地倒闭。

上海待不下去了,张静江点拔蒋介石,广州军政府告急。于是,1922年6月25日,蒋介石去了广州。

1923年,孙中山计划筹建黄埔军校,在最初的校长人选名单中并没有蒋介石。但蒋介石却以这个校长位子应该是他的,得知消息后又气又恼,就从广东跑回了浙江老家去了,并向张静江发泄了一肚子怨气。

不愧为结拜兄弟,张静江不顾身残和路途不便,专程从上海到广州,说服孙中山起用后起之秀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

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

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两个月后,张静江投桃报李,为树立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力辞此职,提名由蒋担任,但北伐期间则由张静江代理该职。

这年6月,张静江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提名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三军。一个管党务,一个抓枪杆子,国民党的天下就基本掌握在他们兄弟俩手里了。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誓师北伐,张静江以代理主席的身份留守广州。

某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以外间对蒋介石非议颇多为由,向张静江建议不如劝蒋辞去党政工作,专理军事。

张静江听后火了,干脆把话挑明:“在前方战事紧张之际,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来做中国的顾问,但并不希望你这样做。”

以前广东国民政府一向以鲍罗廷为中心,得到苏联人的接见被视作一种荣誉,而现在在一个只能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却成了中心。鲍罗廷有什么事情都得与

张静江商量,否则就很难办成。穿着白色的制服,蓄着八字胡、有着优越感的鲍罗廷对这个腿脚不便、瘦小的浙江人特别反感,这种反感到后来逐渐演变为对蒋介石的反感。有人认为,鲍罗廷在武汉进行反蒋活动,就是与他与张静江之间的对立开始的。

1926年12月5日,平静的赣江划开了一道水波,载着第一批广州国民政府北迁人员的轮船到达南昌。

蒋介石一身戎装,乘坐快艇前来迎接,他的身后是两排威武整齐的士兵。

那时南昌已经是蒋介石的天下。各路人士,甚至洋人都来到南昌一探虚实。蒋的总司令部门庭若市。

1926年9月9日,武昌尚未攻克之时,蒋介石就致电留守广州的张静江与谭延闿称:“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

进入浙江后面临的财政问题也向蒋介石建议:

查浙省全省收入照现在情形,每月不过百万元有零,能供军饷只敷四五师之用,将来所需大宗军款均应筹措沪上,故于南京未下以前,非赶组临时财政机关担任处理,不足以资应付。还新察治。

陈是浙江湖州人,是晚清第一批官方派遣赴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回国后先入军界,被授陆军少将,后投身南方的财政金融界,因此对上海金融圈内人很熟悉。他还郑重推荐了北伐军到上海后财政机关领导的人选:

至人选问题,似应选择具有财政经验,熟悉当地情形,且平素倾向革命主义者,最为适当。如现任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镇江人)君堪备担任上海财政之选,拟请存记,至相当时期发表委任。(《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及江浙商人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陈光甫被国民党人看上了——他成了负责在上海筹款的最适合的人选。

蒋介石在为钱发愁时,还想到了另一位大佬,他的结拜兄弟张静江。

张静江被孙中山称“中华第一奇人”。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陈果夫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毛泽东则称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

此人一身侠骨,有血性,甘为朋友两肋插刀,少年时因冲进火海救人被严重烧伤,落下终生残疾,走路一跛一跛,但丝毫不改他侠肝义胆的秉性。

蒋介石结识张静江,是在他的结拜兄弟陈其美处。张静江与陈其美同为浙江湖州老乡。当时蒋介石为陈的部下,给革命元老张静江留下了一定印象。张静江有意考验蒋,常常和蒋交流天下大势、世事哲理,发现蒋介石确有远大志向,便有意栽培。

1916年5月,陈其美惨遭袁世凯暗杀,张静江痛失至交,蒋介石失去靠山。无望之中的蒋介石